



生命树

民间文化新经典译丛

刘魁立 主编

MINSU JIEXI

民俗 解析



[美] 阿兰·邓迪斯 著
户晓辉 编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MINSU JIEX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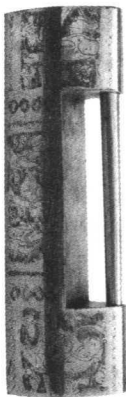
生命树

民间文化新经典译丛

刘魁立 主编

MINSU JIEXI

民俗解析



[美] 阿兰·邓迪斯 著

户晓辉 编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俗解析/(美)邓迪斯著;户晓辉编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

(民间文化新经典译丛)

ISBN 7-5633-5130-2

I. 民… II. ①邓…②户… III. 民俗学-文集
IV. K89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808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20 字数:250千字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7 000 定价:2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民间文化新经典译丛》总序

我曾经主编过一套翻译著作丛书,名为《原始文化名著译丛》,那里所收的外国学人的著作大都是经历过上百年历史考验的学术名篇。20年前翻译出版这套著作自有它的历史背景。关于编辑的初衷,我曾经这样记述过:

……长时间对国外的学术发展闭目塞听的封闭状态,使我们缺少了参考和比较,限制了中国学者才智的发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使我们进步缓慢,研究难以深入,甚至使我们的许多优长也渐渐失去光泽,有的甚至变成不断重复的陈词老调。大家都痛感有尽快改变这种落后状况的必要。为此,首先要运用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深入实际,全面掌握和分析民间文化的现实状况和真实材料;同时还要总结和借鉴人类智慧之光已经照亮的科学发展道路,包括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已经走过的探索历程。……为了认识和分析当代外国的五光十色的新理论、新观点,我认为有必要以简捷的办法和较快的速度追视其历史,明了其根源,这样才不至于在这些时新论调的绚丽的外衣和炫目的光彩面前感到困惑莫解。于是,1985年开始,我策划主编了一套《原始文化名著译丛》,希望能把欧洲民间文化研究最基本的理论著作介绍给国

人,尽快填补这一空白,免去学人再在二三流著作上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我希望我国学界能在较短时间内迎头赶上,充分利用我国的优越条件,做出我们出色的贡献,在广泛的国际学术对话中发出更高更强的声音。

这套丛书陆续出版之后,很快就销售一空。20年过去,至今学界对它仍有需求,于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于2004年重新再版。我以为,像《原始文化》、《人类学》、《金枝(精要)》、《图腾崇拜》等著作仍是有关学者不能不读,而且是常读常新的经典。

然而,和一切事物一样,学术思想总不会停滞不前,总要不断发展。新的材料、新的视角、新的立论、新的学说体系总会不断涌现。半个世纪以来,在国外学坛的民间文化研究领域也确实出现了不少堪称“经典”的学术著作。于是我想,应该不断地将国外学人的新成果纳入我国学者的视野,成为我们学术建设的参照。这不仅会活跃我们的思路,对我们的研究有益,而且会日益增加我们在国际学术对话中的共同语言。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翻译工作,虽不及日本等一些国家的介绍国外学术进程的快速和全面,但是,我们今天在文化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有一批十分在行的中青年学人,他们有理论功底和分辨眼光,能够把国外有关领域的最有新见、最有影响的著作选择出来,提供我国学人参考。于是,在四五年前,在和一些同道商议之后,确定编辑出版一套《民间文化新经典译丛》,作为《原始文化名著译丛》的姊妹篇和当代续集。在这一段时间里,有过一些周折,现在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承担出版重任,这对学界同仁说来是一大幸事,对各位译者说来也是一大幸事。

民间文化饱含着民众生活方式的历史积淀,同时又是今天的生活现

实。当我们说要继承和弘扬民间文化优良传统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说要关爱、保护和发展我们的生存环境和优良的生活方式。这种关爱、保护和发展当然是在充分认识民间文化的本质、形式、功能、价值、既往历史和未来趋向等的基础之上。因此可以说,研究是保护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它的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国外的研究虽然对象不同,视角有异,然而他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会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我们的民间文化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内容极为丰富,为世界其他民族所少见。由于这一层原因,也由于有关学者的艰辛努力,我们在国际学术论坛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我们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响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不断地把握世界学术的脉搏,不断追踪国际学术发展的进程,以利于我们对自己民间文化的认识和研究,以利于作出新的学术建树,从而使我们的保护和弘扬民间文化有更坚实的基础。

在谈到保护和弘扬民间文化优良传统的时候,以往我们更多的是从本国民众福祉以及民族文化发展前景的角度出发,这种视角当然是有道理的,是正确的。然而,到了今天,世界变成了不是修辞意义上的而是确有实际所指的“地球村”的时候,只有民族的视角就是不够的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可能会影响到人类文化发展的单一化,强势文化也在有意无意地鼓吹和助长着文化发展的单一化趋势,然而,单一化终将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悲哀。文化多样性发展不仅是世界各民族的需求,而且是人类社会全面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为了给文化多样性发展创造更多更有利的条件,我们不仅要加强本民族民间文化的研究,而且要广泛地吸纳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扩大交流,不断展开国际学术对话。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殷切期望这套《民间文化新经典译丛》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4 民俗解析

·民间文化是一泓永不涸竭的生命之泉,是一棵永世长青的生命树。我们的中华民族、我们的整个人类社会,因为有了这生命树,有了这生命泉,才会赢得一个更健康、更幸福、更和谐、更绚丽的明天。

刘魁立

2004年12月,北京

序

阿兰·邓迪斯

作为热衷于民俗学(有关民俗的研究)真正是一门国际性学科(Dundes, 1999)这种观念的一个民俗学家,我非常高兴也很荣幸我的一本论文选集被译成中文,我想感谢户晓辉博士为实现这个翻译计划所做的一切努力。

我希望这些文章会激励中国民俗学家们做两件事情。首先是就相互感兴趣的话题更主动地参与到民俗学家的国际对话中去。其次是从民俗的收集和记录转移到分析和解释的批评场域。对于第一个目标来说,中国民俗学家一定像他们之前的芬兰民俗学家和爱尔兰民俗学家那样认识到:不幸的是,世界上多数民俗学家阅读中文绝不比他们阅读芬兰语或盖尔语更多。因此,中国的民俗学家和芬兰民俗学家及爱尔兰民俗学家一样,不得不“发表两次”,即用母语为他们自己的民族发表他们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又要用一种欧洲语言如法语、德语或英语发表这些文章,以赢得更广泛的读者。芬兰民俗学家如果只用芬兰语发表就不可能成为世界知名的民俗学家。可悲的事实是,西方民俗学家们相对极少有向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世界敞开的窗口。虽然有一些概述(参看下文参考书目中引用的那些篇目),但绝大多数中国的民俗和民俗学对西方人来说基本上是一本合着的书,尤其是中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的民俗。在理论上,我们可以等到有更多的西方民俗学家获得阅读中文的知识,但从现实考虑,对于中国最出色和最聪明的年轻民俗学家来说,更明智的是在《亚洲民俗研究》

(*Asian Folklore Studies*)或任何重要的民俗学杂志上发表文章,以成为世界范围内正在进行的民俗学思想对话的一部分。

关于第二个目标,我的印象可能不对,即中国的民俗学家和世界各地如此众多的民俗学家一样,欣赏并真正喜爱民俗,但他们倾向于收集传说、迷信和民歌等诸如此类的材料,却不能以任何有意味的方式分析它。材料收集当然是重要的,但民俗学不可能只是由文本构成,还必须关注语境。谁在其他人的面前把笑话讲给谁听?接受者对某种民俗的反应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这种民俗的意义或多种意义是什么?它可能对于故事的讲述人是一个意思,对于听众又是另一个意思,因此,它是否对不同的听众成员具有不同的意思呢?男人和女人是否以同样的方式理解某种民俗呢?有没有关于男人和女人对某种民俗所讲述的不同异文的研究呢(关于一个颇具启发的例子,参看 Taggart, 1990)?一个足够简单的问题却需要认真的田野作业才能得到一个有意义的答案。民俗的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早就有了,但民俗的心理研究却非常罕见。可是,民俗(包括中国民俗)包含许多幻想的材料,而幻想就需要对心理因素给以一定的关注。是否存在对对中国民俗的深层心理学研究呢?如果没有,为什么会没有呢?

我真诚地希望我这些文章的中译文将激发中国民俗的进一步研究。我要再次感谢户晓辉博士承担了这项有抱负的计划。

引用书目

- Dundes, Alan. 1999. *International Folkloristic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 Eberhard, Wolfram. 1970. *Studies in Chinese Folklore and Related Essays*. The Hague: Mouton.
- Eberhard, Wolfram. 1976. "The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upon Chinese Folklore", in *Folklore*

- Today: A Festschrift for Richard M. Dorson* (Bloomington: Research Center for Language and Semiotic Studies), pp.139—144.
- Eminov, Sandra. 1975. "Folklore and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 *Journal of the Folklore Institute* 12: 257—277.
- Hung, Chang-tai. 1985. *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aggart, James M. 1990. *Enchanted Maidens: Gender Relations in Spanish Folktales of Courtship and Marri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ing, Nai-tung. 1978. *A Type Index of Chinese Folktales*. Helsinki: Academia Scientiarum Fennica.
- Ting, Nai-tung. 1987. "Folk Literature run by the Folk: A New Develop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ian Folklore Studies* 46: 257—271.
- Tuohy, Sue. 1991. "Cultural Metaphors and Reasoning: Folklore Scholarship and Ideology in Contemporary China", *Asian Folklore Studies* 50:189—220.
- Wei-pang, Chao. 1942. "Modern Chinese Folklore Investigation", *Asian Folklore Studies* 1:55—76, 79—88.
- Yen, Chun-chiang. 1967. "Folklore Research in Communist China", *Asian Folklore Studies* 26: 1—62.
- Zhi, Jia. 1986. "Chinese folklore in Recent Years", *International Folklore Review* 4: 18—20.

译者的话

户晓辉

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1934年9月8日生于纽约市,系美国加州大学民俗学和人类学教授。1955年和1958年在耶鲁大学获学士和硕士学位,1962年在印第安纳大学获民俗学专业哲学博士学位。1980年担任美国民俗学会主席兼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北美方面的副主席,研究领域比较全面,包括民间文学理论和方法、象征研究、民俗的精神分析研究、城市民俗、谚语、笑话、北美印第安人的民间故事和童话等。邓迪斯是美国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国际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界有广泛影响。他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二百多篇论文,在美国、芬兰、德国、印度、荷兰等国出版三十余本专著,其中多部获奖:1962年获芝加哥民俗学奖二等奖,1976年获芝加哥民俗学奖一等奖,1993年获国际民俗学和民族志终身成就奖——彼得雷奖(the Pitre Prize),1994获加州大学杰出教师奖。

在当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界,邓迪斯大概是对理论和方法论述最多也颇有创新的一位学者。他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把描述民俗学推向了解释民俗学的新阶段,使传统的对民俗材料的确认和描述走向了深度分析和阐释。四十多年来,邓迪斯主要以精神分析学研究方法著称于同行之间,并引起褒贬不一的评价。有一次,他本人不无幽默地引述了一位民俗学家的话:“邓迪斯是这个没有任何追随者的领域里的头儿!”(Dun-

des is a leader in the field without any followers!)^①邓迪斯对民间文学或民俗的精神分析学研究的确显得有些形单影只,或者说是独树一帜,所以,美国学者法恩(Gary Alan Fine)认为,邓迪斯是目前把精神分析研究作为中心理论参照点的唯一受过学术训练的出色民俗学家,“在真正的意义上,阿兰·邓迪斯就是精神分析的民俗学”。^②邓迪斯运用精神分析方法研究了民间故事、童话、谚语、谄媚语、传说、民族性格(国民性)、体育运动、民间游戏等广泛领域。

邓迪斯曾自称是一个“图书馆民俗学家”,以此和田野工作者形成对比。^③他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文本研究,但研究的领域却非常广泛。由于研究印第安民间故事形态学,邓迪斯被很多欧洲民俗学家称为普罗普在美国的“弟子”。美国学者布鲁斯·罗森伯格指出,邓迪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他有能力把民间故事与其他文化中的其他体裁进行比较。^④美国学者罗丝玛丽·莱维·朱姆沃尔特(Rosmary Lévy Zumwalt,曾经是邓迪斯的学生)认为,邓迪斯是民俗学的核心人物,他通过教学和出版对民俗学的影响就相当于博厄斯对人类学的影响一样大。沃尔夫冈·米德(Wolfgang Mieder,曾经是邓迪斯的学生)甚至认为,邓迪斯对整个民俗学领域都了如指掌,没有哪种民俗体裁没有被他研究过;如果民俗学有诺贝尔奖,那么,

① Rosmary Lévy Zumwalt, Alan Dundes: Folklorist and Mentor, in *Folklore Interpreted: Essays in Honor of Alan Dundes*, p.23,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5.

② Gary Alan Fine, Evaluating Psychoanalytic Folklore: Are Freudians Ever Right? In *Manufacturing Tales: Sex and Money in Contemporary Legends*, p.46, Knoxville: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92.

③ Rosmary Lévy Zumwalt, Alan Dundes: Folklorist and Mentor, in *Folklore Interpreted: Essays in Honor of Alan Dundes*, p.21,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5.

④ Bruce A. Rosenberg, *Folklore and Literature: Rival Siblings*, p.94, p.102,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91.

邓迪斯就是最佳人选。^①从思想深度来衡量,邓迪斯不是一个思想家,但在国际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界,他是理论意识和方法论意识非常强的一位学者。正因如此,编选和翻译邓迪斯这本文集的意义自不待言。

本论文集的编选源于我数年前对邓迪斯的兴趣,直接原因是我承担了一个以邓迪斯为个案的研究课题。要从邓迪斯的几十本书和数百篇文章中编选一个文集,首先得选择他的代表作,其次,我选择的侧重点在于理论和方法论。本书除了《北美印第安民间故事的结构类型学》一篇是因为已有的中译文与原文出入过大而被我重译之外,其他篇目都是第一次译成中文,时间跨度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2002年,希望读者通过本书对邓迪斯大半生的研究成果取得以一斑窥全豹的效果。

邓迪斯教授在得知我的编选计划之后,对我选的篇目表示满意,认为这是“我的论文的一个颇有分量的抽样,它们肯定涵盖了我对民俗的研究”。他热心地寄来了他补充的三篇文章《牧兔者(AT570)中的变异母题的象征对等》、《用精神分析学解释小红帽》和《古埃及“两兄弟故事”中的逆向投射》以及几本新著,授权翻译和出版这本文集,还专门为这本文集写了序言。他认为:第一篇在民俗学方法论中展示了一个新技术;第二篇演示了精神分析研究方法,并且探讨了在中国、日本和朝鲜流传的一个故事,因而中国读者可能对它会有特殊的兴趣;第三篇入选的理由,他没有说,但我想大概是因为它代表了邓迪斯最新的研究成果——这篇文章不仅重新探讨了欧美民俗学家们反复研究的一个非西方的经典故事,而且在2001年罗伯特·斯托勒基金论文奖(Robert J. Stoller Foundation Essay Award)关于行为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精神分析研究年度论文竞

^① Rosmary Lévy Zumwalt, Alan Dundes: Folklorist and Mentor, in *Folklore Interpreted: Essays in Honor of Alan Dundes*, pp. 23—24, pp. 1—2,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5.

赛中,曾获得最佳论文奖。

邓迪斯在自己的文章和书名中喜欢用的名词之一是“analysis”,它的意思是把认识对象分解成若干部分来加以评判和解释,也有反思和抽象的意思,这恰好道出了邓迪斯数十年来的研究特点,也是现代民俗学或民间文学研究的核心特点之一。因此,本书取这个词义,名之为:“民俗解析”。

本书的翻译讲求字面意思的对应。文中的个别难点和德语、法语得到邓迪斯教授本人的指点。部分法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和德语的翻译分别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史忠义先生、王焕生先生,哲学研究所的田时刚先生和文学研究所的金惠敏先生以及张田英女士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译者根据入选的文章重新编辑了参考书目。为了读者的方便,译者还辑录了阿兰·邓迪斯著作要目,作为本书的附录。

目 录

论收集民俗的心理学(1962)	(1)
北美印第安人民间故事的结构类型学(1963)	(13)
美国的民俗概念(1966)	(25)
元民俗与口头文学批评(1966)	(45)
民俗理论的退化论前提(1969)	(59)
牧兔者(AT570)中的变异母题的象征对等(1982)	(75)
谄媚语及女性在西班牙语世界中的二元形象(1984)	(87)
民俗的精神分析学研究(1985)	(114)
人类学家与民俗的比较方法(1986)	(161)
用精神分析学解释小红帽(1988)	(187)
母题索引与故事类型索引:一个批评(1997)	(228)
古埃及“两兄弟故事”中的逆向投射(2002)	(236)
参考书目	(258)
附录:阿兰·邓迪斯著作要目	(278)

论收集民俗的心理学

(1962)

在最近十几年里,职业民俗学家的研究把越来越多的重点放在了获取资料提供人的传记和其他背景信息上。人们期望一位民俗收集者所做的不仅仅是标明他的来源。他还受到鼓励,尽可能多地提供描述他的资料提供人的相关资料。目的大概是有助于把民俗与传统的个体拥有者、特别是文化语境联系起来。和以前用抽象的东西研究民俗材料的做法形成对比,这种对个别资料提供人的新兴趣有助于民俗的社会学研究和心理学研究。不过,奇怪的是,这种收集情况的一个方面仍然无人触及。民俗学家可能更加接近了个人为什么讲故事、唱民歌等等这个恒久问题的答案,但民俗学家在收集民俗时首先具有的动机,却很少被考虑到。尽管理查德·多尔森^①在一篇有关收集民间故事的重要文章中的确问道:“收集者为什么要汇集和出版这些故事呢?”(Dorson, 1957: 54)

为了给这个问题作一个满意的回答,或许有必要研究有关民俗收集者的背景信息。不幸的是,绝大多数著名的收集者,虽然他们有时确实提供了有关其各种资料提供人的大量细节,但都没有提供有关他们自己的相关传记材料。在缺乏这种材料的情况下,收集民俗的心理必然多半仍然是猜测。下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显然是思辨性的,但我真诚地希望,我

^① Richard Dorson(1916—1981),美国民俗学家,主要贡献在于推动民俗学成为美国的一个正式学科,在民间叙事和民俗学史研究方面也有重要贡献。——译注

提出的这种假设框架将得到未来诚实而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收集者所提供的资料的支持或否定。这里不准备讨论所收集的民俗材料的科学价值,也不考虑民俗可能会有的各种用途。只有民俗收集的潜在心理动机才是现在要研究的主题。

人们早就认识到,收集民俗和收集其他物品是类似的。纽厄尔(W. W. Newell)在《美国民俗学杂志》第一期上引用查尔斯·G.利兰(Charles G. Leland)有关民俗收集的流行见解说:“那就相当于聚集了纯粹的小古董和收集传统的邮票和纽扣。”(Newell, 1888d)最近,路易丝·庞德(Louise Pound)也表达了一个类似的看法,只是附带说,民俗是比勤勤恳恳收集的其他很多材料更有收藏价值的物品。

教师、牧师、代理人、作家和其他一些人常常受到激励去猎寻他们自己地区的传统、传说、歌谣和故事。为什么不呢?这些人和那些寻求古色古香的家具、旧玻璃器皿等等的人是同一类型。有些人可能称他们为业余的艺术爱好者^①,但他们的嗜好当然完全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他们的活动对专家也常常是有所助益的。实际上,在我看来,大众传统是比现在常常被热心收集的表盖、球星和电影明星的照片以及孩子中间的纸牌背面图案甚至彩色的奶瓶盖更值得赞美的收藏(Pound, 1952)。^②

但是,多尔森(1957:55)认为,无目的的民俗收集实际上与收集那些不太值得赞许的东西也没有什么不同。他说:“一个不受更大目标的引导

① 原文为 *dilettantes*,这个词含有贬义,暗示这些人没有专门的研究。——译注

② 哈罗德·劳伦斯·莱热(Harold Laurence Leisure)关于他从一个“如此笨重的物品如书、旧式玻璃古董的积习难改的收集者”变为一个热心的民俗收集者的自传性叙述,也证实了各种收集活动的类似关系。参看 *Leisure*(1940)。